

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建设的历程、经验与展望

关成刚

摘要:晚清时期,教授法自日本引入中国。此后,教授法在我国先后演变为教学法、教学参考书,并最终发展为教师教学用书,至今仍被我国教师广泛使用。在发展过程中,教师教学用书注重政治性,始终与国家教育方针、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强调实用性,紧紧围绕教科书进行合理补充与适度拓展;突出创新性,始终兼顾国家教育和教师发展的双重需要;坚持多样性,为教师提供不同选择;追求专业性,通过打造懂教材、懂教学的编写人才队伍,维持自身品质。展望未来,教师教学用书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是必要前提,发掘自身“发展功能”是当务之急,坚持出版发行适度多样化是不拔之策,通过科学研究提升自身品质是必由之路,探索合理的数字化发展路径是长远之道。

关键词:教师教学用书;教授法;教学法;教学参考书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4)02-0046-09

教师教学用书是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科书的必要补充与扩展,对于教师准确理解教科书、合理使用教科书、提高教学质量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晚清时期,教师教学用书以教授法的形式在我国出现,迄今发展已逾百年。审视其百余年发展历程,梳理其基本发展经验,能够为教师教学用书在当前与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有利于高质量教师教学用书建设。

一、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建设的主要历程

1900年,日本人金泽长吉原著、南洋公学师范院译述的《心算教授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授法时代由此开启。20世纪20年代,教授法逐渐被教学法取代。新中国成立后,教学参考书代替教学法,成为最重要的教科书配套教

材。20世纪90年代,教学参考书演变为教师教学用书,至今仍被我国教师广泛使用。

(一) 教授法时代(1900—1921年)

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先觉者们力求通过兴办新式教育实现强国御侮。然而,新式教育的发展既需要新式教科书,也需要大批能够教授教科书的新式教师。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授法被引入中国。

最初在中国出现的教授法,是“南洋公学师范院译述本”^①。彼时南洋公学师范院的学生往往还要兼任外院、中院教师。因此,师范生们译述了一些国外教授法著作,以满足自身学习教法知识的需要。但是“南洋公学师范院译述本”无法与当时迅速发展的国人自编教科书形成充分呼应,难以为教师适应新式教育提供足够支持。在此之后,一种由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一般资助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材中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探索”(2003028)。

作者简介:关成刚,人民教育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北京 100081)。

^① 南洋公学董瑞椿、朱念椿、张相文等人自1900年开始,译述了日本人金泽长吉著《心算教授法》、富泽直礼著《小学地理教授法》等教材,封面均印有“南洋公学师范院译述本”字样。

国人自编，与新式教科书配套出版的教授法开始出现，并产生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

1904年年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几乎与此同步，商务印书馆率先推出适应新学制的“最新教科书”，并在国内首次出版了与教科书配套的各类教授法。至1907年夏，商务印书馆已出版“最新教科书教授法”^① 7种33册。

“最新教科书教授法”为教师使用教科书开展教学提供了便利的“拐杖”。其核心栏目有三个：“本课要旨”，指明了每课的教学主旨；“教授次序”，精细化指导教师课堂每个环节的言与行；“习问”，则提供了课后习题。对于未接受过新式教育，却要在新式学堂授课的大批教师而言，“最新教科书教授法”的问世如同及时雨。由此，“教授法销行之数目，渐见发达”^[1]。

“最新教科书教授法”的成功，很快引来了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等其他出版机构的关注。他们“相率而则效之”^[2]，教授法由此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教学法时代（1922—1948年）

教授法虽然有利于教师初步适应新式教育，但弊端显而易见：“教师竟可不必准备，径挟书而入教室。”出现这一状况主要是因为教授法“每课均有长篇教案”^[3]。详细的教案方便了教师的教学，但也导致了教学的高度僵化，以及儿童的课堂需求被无视。这显然不符合新式教育长期发展的需要，一场新的改革势在必行。

1918年，陶行知提议将“教授法”课程改为“教学法”课程。数年之后，“在教育法令、教育著作、教育刊物以及教师的日常教育语言中，‘教学’也完全取代了‘教授’”^[4]。教材也不例外，1922年9月，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儿童文学读本教学法》，教学法的时代到来了。

教学法呈现与教授法截然不同的新气象。一是大力提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比如，在选择教材内容时，强调要适应儿童心理发展需求。在制订教学目标时，尝试从“教者目的”和“儿童目的”两个维度进行描述。在设计教学过程时，强调使儿童亲自体验。甚至在设计习题时，也注

重创设符合儿童认知水平的试题情境。二是努力提升教师教学主动性、创造性。教学法认为，逐课编写教授详案会严重束缚教师；遂“力矫此弊”，以教案举例取代教授详案。同时，教学法普遍提高了参考资料比重，为我国教师教学主动性、创造性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教学资源支持。

伴随着教学法的崛起，教授法日益式微，并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退出历史舞台。但教学法的“大一统”时代并没有持续太久。新中国成立后，一个属于教学参考书的时代到来了。

（三）教学参考书时代（1949—1989年）

新中国成立后，教材成为除旧布新的战略抓手。在此历史背景下，新中国教学参考书诞生并呈现三大鲜明特色。

一是在出版发行方面，教学参考书由无序走向统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春明等私营出版社大量发行粗制滥造的教学参考书，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教育部、出版总署遂在1954年决定，教学参考书一律由国营出版社出版。^[5]自此，教学参考书的出版发行进入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主体、各地国营出版社协同共建的统整时代。人民教育出版社承担起大部分工作，仅在“文革”前便出版教学参考书64种187册。地方国营出版社也根据本地教师需要出版了部分教学参考书，形成对人教版教学参考书的合理补充。

二是在内容设计方面，教学参考书突出对教科书的解读。相比于“博采有关于本课的资料”^[6]的民国时期的教学法，许多教学参考书减少了参考资料篇幅，仅“对有的课文提供了一点有关的资料”^[7]。与此对应，教学参考书增加了“教材分析”“教材研究”等“教材解读”类栏目，甚至一些教学参考书明示，本书每一项内容都体现着教材编写者的意图。

三是在功能指向方面，教学参考书侧重为教师的教服务。民国时期的教学法提供的教学建议往往强调依据儿童学习心理。教学参考书则更侧重为“教师如何教”提供指导与参考。例如，“在讲课时，教师的语言应当是具体的、生动的”“复习的基本方法是谈话法。教师按照拟定的复习提纲向学

^① 190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冠以“最新”字样的修身、国文、笔算、格致等学科教科书约70余种，学术界统称其为“最新教科书”。部分“最新教科书”配有教授法，在此统一表述为“最新教科书教授法”。

生提问”^[8]。对于“教师如何教”的高度重视，使教学参考书一度被中小学教师奉为“教育圣经”。

（四）教师教学用书时代（1990年至今）

1990年秋季，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第八套通用教科书开始在部分学校试用。与此同时，与该套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也陆续出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以“教师教学用书”命名这一类教材。新生的教师教学用书也呈现三大鲜明特色。

一是教师教学用书呈现出明显多样化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编写、出版了不少教学参考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围绕人教版教科书编写的，属于人教版教学参考书的补充。而教师教学用书问世之际，恰逢我国义务教育教材“一纲多本”和教材建设多样化新阶段开启之时。因此，各地在编写、出版多样化教科书的同时，也配套编写、出版了风格更趋多样、特色更加鲜明的教师教学用书，使教师拥有了更多选择。

二是教师教学用书内容设计日臻完善。教师教学用书在重视解读教材的基础上，加强了其他各类栏目建设，力求为不同需求的教师提供教学支持。以参考资料为例，一方面，教师教学用书改变了教学参考书“力避多所征引”^[7]的做法，扩大了参考资料篇幅；另一方面，教师教学用书通过精细化分类，保障参考资料类型的丰富。例如，一些物理教师教学用书将参考资料分为“实验天地”“物理史话”“物理广角”等若干部分，兼顾了教师多方面教学的需求。

三是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团队进一步优化。在教学参考书时代，出版社习惯于邀请有经验的中小学教师作为主要编写者。但近年来，一些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越发强调教科书编写者的深度参与。教科书编写者对教科书编写意图等方面的理解，是任何教师都难以企及的。他们的深度参与，使教师教学用书的整体水准超越了教学参考书，成为更具权威性的教学材料。

二、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建设的基本经验

教师教学用书历经百余年建设，积累了重要

的发展经验。这些经验既使教师教学用书始终保持发展活力，也为教师教学用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经验启示。

（一）注重政治性，与国家教育方针、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是教师教学用书长期发展的基本遵循

“教材反映了一种具体意识形态的立场。”^[9]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教学用书始终注重政治性，强调自身发展与国家教育方针保持一致，忠实反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一方面，教师教学用书重视编写指导思想与国家教育方针的一致性。1906年，清政府颁布“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其后出版的一些教授法迅速将其奉为圭臬，如1907年出版的《初等小学体操教授书》“明诏尚公尚武之旨”^[10]。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新教育宗旨，大量“依据教育部公布之教育宗旨”^[11]的教授法随即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的思想品质”^[12]更是成为各类教学参考书编写普遍、长期遵循的基本准则。

另一方面，教师教学用书注重在书中各个环节渗透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教授法”^①系列具有典型代表性。例如，“国文”教授法建议以五色旗为教具，引导学生学习各种颜色对应的汉字。历史教授法在“内容提示”中指出三国分立源于曹操、刘备、孙权三人的帝王思想，以国民为前提才是国家巩固统一的基础。修身教授法在各课“教授目的”中不断强调公德、公义、爱国、守法等要旨。即便是高度重视科学性的理科教授法也在“卫生”等课中强调了个人责任与公众利益的关系。其他各类经典教师教学用书均比较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进而影响着学生的思维。

（二）强调实用性，紧紧围绕教科书进行合理补充与适度拓展，是教师教学用书扎根中国大地的关键所在

晚清时期，教授法自日本引入中国。经过百

^① 1912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冠以“共和国教科书”字样的系列教科书。该系列教科书配套的教授法，在此统一表述为“共和国教科书教授法”。

余年建设,由教授法发展而来的教师教学用书已然形成了强调实用性的固定风格,呈现与国外教师指南等辅助教材迥然不同的发展特点。

教师教学用书强调实用性的突出表现,是其坚持做教科书最重要的配套辅助教材,紧紧围绕教科书进行编写。一方面,在编写思想上,教师教学用书高度重视与教科书保持适配性。各个时期的教师教学用书都要在前言、编写说明等部分强调自身与教科书相辅而行,是配合教科书而编写的参考书。另一方面,在编写实践中,教师教学用书将自身定位于教科书的合理补充与适度拓展。其主要栏目,如“教材分析”“教学建议”等都依据教科书而设计。即便是“参考资料”栏目往往也是“记载研究各课时,必须补充的资料”^[13],极少脱离教科书进行拓展与延伸。

而发展至今的国外教师指南,则“有时与教材无关”^[14]^[25]。在一部分国外课程教材研究者看来,教科书仅仅是众多教学材料之一;教师指南也可以作为一种教学材料独立于教科书而存在。但历来依赖教材的中国教师,很难接受这一理念,在他们的观念中,教科书就是不可替代的主要教学材料,任何脱离教科书进行的教学拓展与延伸都是华而不实的。因此,百余年来,我们的教科书编写者习惯于把无法在教科书中充分阐明的问题放在教师教学用书里进行阐明。我们的教科书使用者也习惯于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寻找理解教科书、使用教科书的参考建议。在教师看来,紧紧围绕教科书进行合理补充与适度拓展的教师教学用书就是最实用的辅助教材。这是教师教学用书得以长期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教育的关键所在。

(三) 突出创新性,始终兼顾国家教育和教师发展的双重需要,是教师教学用书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原因

创新性是教材建设保持活力的源泉。有研究者认为,教师教学用书的内容设计一直缺少优化创新。但实际上,百余年间,教师教学用书中的一些经典栏目消失了,一些全新栏目出现了;部分一直存在的传统栏目也在内容呈现方面不断变化。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15],但现实是“地僻则师资缺

乏”^[16]。面对这一困局,“最新教科书教授法”首设“教授次序”“凡为教师谋者无不备详”^[17]。其他书局也不甘落后。例如,彪蒙书室分类设计了“文言教法”与“白话讲义”,分别供教师平时预备和课堂讲授之用。中国图书公司创设了课时教学计划,便于教师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教授法内容的持续优化既“大受教育界之欢迎”^[2],帮助广大教师初步适应了新式教育,也为清政府破解师资匮乏问题提供了重要路径选择。^[18]^[156]

中华民国成立后,政府力图建立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教育体制,但各地“普及教育的师资养成缺乏良策”^[19]。基于这一状况,民国时期的教授法及教学法继续优化内容设计。“教法”类栏目的改进最具有代表性。大部分教师无法离开“教法”指导,而资本主义民主教育又要求课堂教学开放、多元。因此,编写者对“教法”类栏目进行了由形式到内容的持续优化。形式优化即教案举例逐步取代教授详案。内容优化更为关键,即教案举例不再固守“五段教授法”,而是模拟不同的教学情境,提供不同的教法选择,以便教师“颠倒活用”“随机加减”^[20]。多样化的教法指导既为教师提供了更多教学改进空间,又为资本主义民主教育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材使用,认为“教材绝不是每个教师可以自由裁量随意选择教还是不教、教哪些不教哪些的文本”^[21]。为落实党的教材理论,也为帮助教师把教材教好,教学参考书编写者设计了内容丰富的“教材解读”类栏目。例如,对疑难名词和问题进行解释的“教材注释”;对关键问题进行补充性叙述和说明的“教材分析”;对每一章节主要内容、结构组织、前后联系进行扼要介绍的“教材说明”等。内容设计优化后的教学参考书“对教师帮助不小”,使“提问教科书内问题的来信大大减少”^[22],为新中国教育和教师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日益重视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广大教师的专业发展诉求也不断提升。教师教学用书也持续以内容设计的优化满足了国家教育和教师发展的高质量追求。一方面,新型栏目设计不断出现。例如,对学生可能遇到的困难等进行剖析的“学习分析”。另一方面,一些经典栏目的内容设计也在改进。例如,“教

材分析”中出现了“内容取舍的考虑”。这些设计改进既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学生的学”，符合教育改革方向，也可以帮助教师更好地理解教科书，符合教师自身专业发展诉求。

总之，百余年来，教师教学用书不断以内容设计的优化创新，兼顾国家教育和教师发展的双重需要。这是教师教学用书至今保持发展活力的重要原因。

(四) 坚持多样性，不同的出版发行机构共同参与竞争、合作，是教师教学用书满足使用需求的宝贵经验

不同于经历了多次统编的教科书，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始终走在多样化发展的道路上。

晚清、民国时期的教授法、教学法长期实行出版审定制。1906年，清政府学部规定各书局教科书“有教授法者兼审教授法”^{[18]40}，拉开了教授法、教学法审定的序幕。此后近半个世纪，多家机构出版了近七百种审定通过的教授法、教学法。以晚清为例，自1906年学部推行教授法审定，至1912年清帝退位，中国图书公司出版教授法至少16种，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教授法至少11种，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授法至少8种，集成图书公司、文明书局、会文学社各出版教授法至少4种，乐群书局出版教授法至少2种，彪蒙书室、国粹研究会、普及书局、科学会编译部各出版教授法至少1种。民国时期的教授法、教学法出版也始终呈现多样化。即便是在国民政府强推国定本教科书及配套教学法的时代，这一状况也未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教科书及配套教学参考书的出版进行了统整。但不同于教科书“一律由国家指定的出版社出版”，教学参考书可以由国营（包括地方国营）出版社出版。^[5]这就意味着，教学参考书出版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多样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7年，为满足本地教师教学需要，各地出版了不少与人教版教科书配套的教学参考书，形成了对人教版教学参考书的合理补充。“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相关工作陷入停滞。各地依据本地教育需求自编教科书，配套编写了形式多样的教学参考书，交由地方人民出版社或者地方印刷厂印行。“文革”结束后，我国教科书建设逐渐步入“一纲多本”时代，与各版本教科书配套的各类教学参考书、教师教学

用书不断问世，多样化发展依然在延续。

教师教学用书出版发行的多样化，使教师在备课、教学时拥有了更多选择。例如，有教师就提出，各版本教师教学用书各具特色，最好“交叉互补，整合升华”^[23]。由此可见，教师教学用书出版发行多样化，满足了教师的使用需求，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认可与支持，是应当长期贯彻的宝贵经验。

(五) 追求专业性，着力打造懂教材、懂教学的编写人才队伍，是教师教学用书保障自身品质的力量依托

教材品质关乎教育质量。实践证明，高品质的教师教学用书，一定是懂教材、懂教学的专业人才队伍编写出来的。

晚清、民国时期，各科教授法、教学法往往由一至两人编写。其中的许多编写者都是既了解教科书又了解中小学教学的专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新教科书教授法”便是典型例证。翻开“最新教科书教授法”，我们可以看到张元济、蔡元培、杜亚泉、蒋维乔等人的名字。这些后世赫赫有名的人物在编撰或校订“最新教科书教授法”时，至少具有三方面共同点。其一，他们彼时多为三四十岁的年纪，已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其二，他们往往也是“最新教科书”的编撰者或校订者，对教科书的理解和把握，无人能出其右。其三，他们大都具有开办新式教育或任教于新式学堂的经历，实践经验丰富。由此可见，“最新教科书教授法”在当时能够取得成功，得益于商务印书馆打造了一支懂教材、懂教学的专业编写人才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代表的教材编写出版机构开始倾力打造学科专家、专业编辑与一线名师或教研员三结合的编写团队。教师教学用书三结合的编写团队中，一线名师或教研员的作用更加突出。例如，现行义务教育历史教师教学用书便由参与教科书编写的学科专家和资深编辑担任主编，并由多名一线中小学教师担任主要编写者。这样三结合的编写团队，一方面能够发挥学科专家、专业编辑的主导作用，保证教师教学用书对教科书内容、学科专业知识解读准确无误；另一方面能够调动一线名师或教研员的主观能动性，保证教师教学用书紧贴一线，满

足中小学教师的实际教学需要。由此，教师教学用书品质得到了充分保障，日益成为教师日常教学中不可或缺的教材资源。

三、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建设的未来展望

历史学家卡尔指出，根据过去经验概括的预言，也是有效的、有用的行动指南。因此，基于教师教学用书百余年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对教师教学用书的未来建设作出展望。

（一）确保正确政治方向是必要前提

百余年间，教师教学用书的编写者始终努力与国家教育方针、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未来，教师教学用书更应确保正确政治方向，为全面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作出贡献。

落实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教师准确理解教科书、合理使用教科书。教师在接受和传授教科书内容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失真现象。^[24]如果这一失真现象过于严重，那么高品质的教科书就无法完成育人育才的使命。这就意味着，高品质的教师教学用书弥足珍贵，它能够教师准确理解教科书、合理使用教科书提供基本保障。

编写高品质的教师教学用书，首先一定要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唯有政治方向正确，教师教学用书才能够与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教科书在整体上具有一致性，教师才能够通过教师教学用书更好地理解教科书、使用教科书。如此一来，教科书才能完成育人育才的使命。如果编写者罔顾政治方向问题，将教师教学用书作为个人观点的“秀场”，公开表达对教科书主要观点的批判、质疑，一线教师就会因此无所适从，从而导致教科书无法充分发挥正向教育作用。这样的反面案例曾经在晚清、民国时期出现过，我们应当引以为戒。

确保教师教学用书政治方向正确，一方面，需要教材编写机构、教材主管部门从思想上充分重视教师教学用书的政治作用。相关机构、部门要认识到，教师教学用书是能够影响教科书传递国家意志、完成育人育才使命的重要辅助教材，不是可编可不编、可审可不审的。另一方面，需要教材编写机构、教材主管部门从行动上积极落实教师教学用书政治审查工作。教材编写机构与

教材主管部门应各司其职，严格把控好教师教学用书编写人员遴选、编写过程监管、使用过程反馈等关键环节。唯有如此，教师教学用书方能在正确道路上长期、健康发展，成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重要支撑。

（二）发掘“发展功能”是当务之急

“支持教师专业发展”是教师教学用书的重要功能。由于我国师资力量长期薄弱，编写者往往更注重“提供教学基本保障”，这使教师教学用书一度被质疑，认为其限制了教师发展。

时至今日，发掘教师教学用书“发展功能”必须提上日程。从国家层面而言，今日中国要建设教育强国，必须实现教师群体专业化水平大幅提升。从教师层面而言，我国教师整体素质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教师渴望专业发展。这意味着，如果教师教学用书仅满足于“提供教学基本保障”，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

“随着教龄的增长，教师逐渐摆脱教师教学用书。”^[25]教师教学用书很难为教师持续提供专业发展支持，重要原因就在于许多经验丰富的教师“知识结构发展的重点转到了学科教学法知识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上来”^[26]。因此，教师教学用书可以搭建教师掌握学科教学法知识的平台，以此来发掘自身“发展功能”。

首先，教师教学用书中的“教学建议”类栏目可以加强对“为什么这样教”的回应。一直以来，教师教学用书提供了不少“怎么教”的建议，但往往“没有更多地解释‘这样教学的潜在学理’”^[27]。学科教学法知识强调学科知识与有效教学方法融合。^[28]如果教师无法获得“为什么这样教”的学理分析，就难以将教学建议转化为“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教师教学用书可以完善“教学意图分析”，使“教学建议”类栏目进一步阐明“为什么这样教”，助力教师掌握学科教学法知识，实现专业发展。

其次，教师教学用书可以完善“评价建议”类栏目，帮助教师了解自身“教得怎样”。学科教学法知识重在使学科知识“有效教学化”^[28]。如何衡量教师是否“有效教学化”？教学评价建议和工具非常关键。在这方面，我国教师教学用书建设相对不足，有许多教师反映教师教学用书“教学评价的部分对教学实际基本没有作用”^[29]。

未来,编写者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完善“评价建议”类栏目,以多元化评价策略和多样化评价工具帮助教师完善学科教学法知识,加快专业发展。^[30]

(三) 坚持适度多样化是不拔之策

马克思认为,每一代人都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教师教学用书建设也是如此,即使环境改变,仍然有一些重要经验,如教师教学用书适度多样化,需要我们继承、坚持,不应轻易变更。

教师教学用书适度多样化是由教师专业发展诉求的多样性决定的。一方面,不同地区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诉求不同。中国各地教师专业素养参差不齐,被偏远农村教师广泛认可的教师教学用书,可能无法满足一线城市教师专业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诉求不同。甲教师追求教学深度,希望教师教学用书提供透彻的教材解读,认为教学建议简单易行即可;乙教师推崇课堂生动,希望教师教学用书提供丰富的教学建议,认为教材解读点到为止即可。这些不同的专业发展诉求很难在一本教师教学用书中有效调和。因此,只要教师存在多样性的专业发展诉求,教师教学用书就应当适度多样化。

在当前和未来,教师教学用书适度多样化的焦点问题是统编三科教科书是否应配备多样化教师教学用书。实际上,为统编教科书配备多样化教师教学用书一直是党和政府支持的举措。例如,1957年处于新中国第一次教科书统编通用时期,浙江省教师进修学院“为了帮助高二历史教师解决困难”,“在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二历史教学参考书’的基础上”编写了地方适用的教学参考书。类似的事例在新中国教师教学用书发展史上并不罕见。这足以证明统编教科书可以与多样化教师教学用书并行不悖。

当然,教师教学用书多样化,必须要坚持适度原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春明等私营出版社大量粗制滥造教学参考书的历史事件警示我们,教师教学用书出版发行完全放任也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教师教学用书的专业审查工作,确保教师能够获得多样化、高品质、各具特色的教师教学用书,从而满足自身专业发展的需要。

(四) 深入开展研究是必由之路

编写高品质的教师教学用书,既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力量依托,也需要扎实的研究作为专业支持。例如,蒋维乔等人“广搜日本之教授书,加以研究”,才编写出“销行之广,几并于教科书”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31]

然而,百余年来,教师教学用书研究成果虽然不少,但大量成果都停滞在实践探索层面,创新性不够。例如,1931年,何西豪就提出教授书只能供教师参考,直到21世纪,仍有研究者不断重复类似观点。这样的研究成果即使再多,也很难为教师教学用书的深度发展提供帮助。

“教材是个专业,也是门学问,不能光凭经验办事。”^[32]作为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教学用书研究亟待提上日程。

深入开展教师教学用书研究需要专业研究人士参与。我国有专业研究人士参与教师教学用书研究的传统。例如,在1930年,杜亚泉就曾撰文讨论过教授法的编写改良问题。但时至今日,“理论研究者和教学用书编制者参与的研究很少”^[27],中小学教师和教研员担纲了研究主力,但他们往往以教学实践见长,教育研究能力相对不足。因此,专业研究人士参与才是教师教学用书研究深入开展的基本保障。

深入开展教师教学用书研究,需要科学研究方法的合理应用。长期以来,教师教学用书研究多以实践经验介绍为主。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如历史研究法,一直较少被应用,留下了大片研究空白。还有一些科学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法,虽然应用较广,但规范性明显不足。唯有各类科学研究方法得到合理应用,教师教学用书研究方能真正步入科学化轨道。

深入开展教师教学用书研究,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如何能使专业研究人士积极参与教师教学用书研究?社会各界力量的支持是关键。一方面,管理部门应明晰教师教学用书的专业价值,认识到其与教科书“加在一起作为一种复合的材料,对学生成绩的影响比完善课程或教学手段的影响可能更大”^{[14]128}。另一方面,学术机构应给予教师教学用书研究适度发展空间,如一部分立项课题名额、论文发表版面等。唯有如此,才会有更多专业人士乐于参与研究,为教师教学

用书的高品质发展持续提供保障。

(五) 探索合理的数字化发展路径是长远之道

未来,传统教师教学用书有可能被数字教师教学用书取代。数字化发展能使教师教学用书继续保持发展活力,满足使用者期待。

发掘教师教学用书“发展功能”是国家教育和教师发展的双重需要。然而,传统教师教学用书的两大痼疾限制了其“发展功能”最大化。一方面,传统教师教学用书在内容选择上具有局限性。面对教师多样性的发展诉求,如果编写者面面俱到,会导致教师教学用书越编越厚,不便使用。如果编写者精简内容,又可能导致部分教师难以获得专业发展支持。另一方面,传统教师教学用书内容更新慢,互动性弱,前沿的学术动态、教育思想等很难在教师教学用书中及时呈现。这就容易导致教师产生教学困惑,也难以与编写者和其他使用者及时交流。

在数字化过程中,传统教师教学用书的两大痼疾在理论上都将一一消解。一方面,数字教师教学用书具有“超链接编辑和非线性阅读的优势特性”^[27],能够以相对简约的方式呈现大量资源,使不同层次的教师迅速获取所需知识。另一方面,实时性和交互性都是数字化的典型特点。利用网络资源,数字教师教学用书能够实现自身内容快速更新,并为编写者与使用者的互动搭建平台。因此,在发掘“发展功能”方面,数字教师教学用书具有巨大的优势,代表着教师教学用书的未来发展方向。

从当前看,教师教学用书会逐渐向“纸质+数字化”形态过渡。有研究认为,数字教材能否在教学中获得应用空间,取决于纸质教材能否满足教育教学需求。^[33]教师教学用书中的“教材解读”“教材分析”等栏目内容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无论纸质还是数字化形态,都不影响教师参考。因此,这些栏目没有迈向数字化的紧迫性。而教师在教学时,需要参考多样化的教学建议、实时性教学资源,这就使“教学建议”“参考资料”等栏目可能会率先迈向数字化。

在更加遥远的未来,数字教师教学用书可能成为主导,并与数字教科书深度融合。一方面,我们“无法阻止数字化时代的前进,就像我们无法对抗大自然的力量一样”^[34]。当人类习惯甚至

依赖数字化阅读后,数字教材必将成为教材主导。另一方面,在未来教育中,教与学的界限藩篱或许会被彻底打破。届时,继续严格区分教科书与教师教学用书已然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畅想这样的画面:一位学生阅读着教科书与教师教学用书融合后的数字教材。他时而阅读一段课文,时而点击超链接,将一段“教材分析”呈现出来。或许在未来某一个时刻,这一场景将成为教育常态。

参考文献:

- [1] 蒋维乔. 蒋维乔自述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 19.
- [2]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卷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29.
- [3] 董远骞, 施毓英. 俞子夷教育论著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477-479.
- [4] 章小谦, 李屏. 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考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05(2): 87.
- [5]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351.
- [6] 宋子俊. 高小社会科地理编教学法: 第1册 [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4: 编辑要旨.
- [7] 人民教育出版社. 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试用本)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说明 13.
- [8] 王永兴, 王剑英. 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一册教学参考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7: 14-15.
- [9] 阿普尔, 史密斯. 教科书政治学 [M]. 侯定凯,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6.
- [10] 学部编译图书局. 初等小学体操教授书 [M]. 北京: 学部编译图书局, 1907: 凡例.
- [11] 赵玉森. 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教授法: 第1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2: 编辑大意.
- [12] 江苏教育编辑部. 高级小学历史课本第一册教学参考资料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55: 前言.
- [13] 杨卿鸿, 糜赞治, 华襄治. 新中华自然课本教授书 [M]. 上海: 中华书局, 1932: 编辑大意.
- [14] 江山野. 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 课程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1.
- [15] 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4798.
- [16] 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1: 442.

- [17] 周振鹤. 晚清营业书目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300.
- [18] 李桂林, 戚名琇, 钱曼倩.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普通教育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7.
- [19] 董宝良, 陈桂生, 熊贤君. 中国教育通史: 中华民国卷: 中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33.
- [20] 周尚志, 沈百英, 王芝九, 等. 儿童文学读本教学法: 第1册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2: 2.
- [21] 石鸥, 刘艳琳. 中国共产党百年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中国智慧 [J]. 教育学报, 2021 (5): 78.
- [22] 湖南教育出版社. 辛安亭论教育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3: 234.
- [23] 王世存, 王后雄, 周竹. 现行3套高中化学教师用书特点评析与使用建议 [J]. 化学教育, 2012 (8): 5-7.
- [24] 石鸥. 试论教师传授教学内容时的失真现象 [J]. 上海教育科研, 1995 (7): 27-30.
- [25] 陈肖宇, 李佳. 中学化学教师教学用书教学属性的调查研究 [J]. 化学教育, 2017 (7): 63.
- [26] 叶澜, 白益民, 王枏, 等. 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300.
- [27] 刘晓艳, 杨南昌, 陈祖云, 等. 面向教师学习: 数字时代教学参考书的功能转变与编制创新 [J]. 电化教育研究, 2016 (10): 109-115.
- [28] 曾文婕. 从课目教学知识到课目学习知识: 教师专业知识发展的新方向 [J]. 教育研究, 2020 (8): 142.
- [29]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 中小学教学参考书调查问卷分析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23.
- [30] 《基础教育教材建设丛书》编委会. 中外中小学教学参考书比较研究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35.
- [31] 周德明, 吴建伟. 上海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续编: 58 [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9: 306.
- [32] 郭戈. 教材是个专业, 也是门学问: 《学科教材论》丛书总序 [J]. 人民教育, 2021 (15-16): 125.
- [33] 王润. 数字教材与纸质教材关系演进: 历程、逻辑与展望 [J]. 教育学报, 2021 (5): 117.
- [34]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M]. 胡泳, 范海燕,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269.

(责任编辑: 穆建亚)

Evolution, Experience and Prospect of Teacher's Book Construction

Guan Chenggang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eaching book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from Japan and transformed into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reference book and teacher's book, still widely used by Chinese teachers today. Throughout its evolution, teacher's book focuses on politics and maintain consistency with national policy and mainstream ideology, focuses on practice and supplement and expand based on textbook, focuses on innovation and balances the dual needs of national education and teacher development, focuses on diversity and provides teachers with various options, and focuses on professionalism and maintains its quality through faculty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teacher's book should take ensuring political correctness as necessary prerequisite, digging out its development functions as mission, diversifying publication and distribution as policy, improving its quality through scientific research as path, and exploring digitization as destination.

Key words: teacher's book; teaching book; teaching method; teaching reference book